



尼尔·弗格森著作中译本

← (上接2版)

役本身，而不涉及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那么这部历史作品就有成为“战争色情史”的风险。因为，这就相当于历史学家只把最刺激的战争场面、战争故事呈现给读者。这样就会扭曲事实，误导读者，甚至会让一些读者把战争理解为“刺激”的事情，而非“糟糕”的事情。

最让人恼火的是，有些人写二战，却没有列出任何关于主题的参考资料，其中就包括我本人的作品。我写一个历史题目，除了战争、战役本身，还会把它们还原进当时的整个社会面貌之中，告诉读者一场战争的发生是整个社会动员的结果，而不是让战争脱离其发生环境和土壤。我认为，没有人可以简单地把一战、二战或者任何一场现代战争呈现为海、陆、空三军，一场场战争、战役的串联，因为整个人类社会都受到20世纪战争的影响，而不是只有那些让人“兴奋”的战争场面，还有“大屠杀”。这种关于历史发出的声音对我而言都是刺耳的。

我愿意写那些渐渐走出了西方人记忆的历史，比如日本侵华战争，因为大多数西方的战争历史学家更青睐发生在欧洲战场、或者美日之间的战争。

某种意义上说，我是在批评那些老旧的历史描述方式。

文汇报：历史学家理查德·埃文斯 (Richard Evans) 曾表示，“弗格森的原创思想很多，他喜欢提出具有挑衅性并且往往不公正的问题”。对于这种评价，您是否认同？

尼尔·弗格森：我认为，我的历史书写一直是非常准确的。如果要批评一个人不准确，就要给出“不准确”的例子，

而非简单地一个判断了了事。

长久以来，我和理查德·埃文斯之间都没能就“历史学家是否可以提出‘反事实’的问题、假设命题的问题”达成共识。我认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可以、并且必须问出“如果希特勒在1939年前就被刺身亡，历史会是怎样的模样”的问题。只有不断提出这样的问题，才能够真正

地了解历史。相反，埃文斯则认为，历史学家就是应该记录那些发生了的事情，而非涉及那些没有发生的事情。我认为这是错误且愚蠢的。

事实上，我们之间的学术争论也和政治扯上了关系。我和埃文斯之间有很多问题没有达成共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我认为，一个人在不明确任何“不准确的例子”的情况下，妄言另一个人是“不准确的”，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不准确的。

我会继续努力，去影响政策的制定者

文汇报：2016年，您曾和哈佛大学同事格雷厄姆·艾利森 (Graham Allison) 联名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呼吁美国联邦政府资助一个“历史顾问委员会”。三年时间过去了，您对此的看法依旧吗？

尼尔·弗格森：基辛格曾说，对历史的诠释是一个国家记忆的映照。显而易见的是，既然美国总统已经有了经济顾问委员会，为什么不能够增设一个“历史顾问委员会”呢？事实上，多年来美国政府重大政策的制定上接连犯下错误，症结便在于总统对于“以史为鉴”的忽视，这些年来伊拉克土地上所发生的就是最好的证据。2003年，当乔治·布什总统选择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时，他似乎都没有完全理解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区别，也不了解萨达姆政权是由少数的逊尼派领导，打压占多数的什叶派群体。他没有听到警告，而这一行动可预见的后果将是一个什叶派主宰的巴格达支持中东的什叶派大本营——伊朗。

我和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但并没有指望事情会完全按照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发展。但至少，我可以继续努力去影响政策的制定者。至于我本人，我可以通过演讲和写作，告诉人们在面对当下一些棘手问题时，有哪些历史经验可以学习、借鉴。

我并非一定要看到“历史顾问委员会”建立起来，但我相信，如果“历史顾问委员会”真的建立起来，那将是一件很不错的的事情。

文汇报：普林斯顿大学历史教授杰里米·阿德尔曼 (Jeremy Adelman) 曾发问，“究竟是国家需要历史学家，还是历史学家需要国家”？似乎学者对于历史学家参与国家治理的程度有不同理解。您如何理解知识分子的“责任”？

尼尔·弗格森：如果一个历史学家认为，践行自己的责任就是给象牙塔里的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学生授课，那么，在我看来，他对于“责任”的理解过于狭隘。我们这些研究“昨天”的人的责任不只在告诉哈佛、牛津，或者清华的学生“从前发生些什么”，而是要面向更大范围的公众，面对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把历史的经验解释给今天那些制定政策的人。比如说，怎样的中美关系更有利于两国人民的利益？更有利于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我相信历史学家可以给出一些建议。

总之，历史学家可以以“坐在讲桌前教课”为己任，但势必要有人站出来发声，否则，“以史为鉴”恐怕只能是句空话了。

策划：
文汇报理评部
执行编辑：
李纯一 licy@whb.cn
封面编辑：
陈韶旭 csx@whb.cn
封面图片：
约书亚·雷诺兹爵士对拉斐尔《雅典学院》的仿作 (1751)，《广场与高塔》引用此图说明启蒙网络以旅行和通信为基础
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关注文匯學人



欧洲人对中东和东亚——他们后来称之为“东方”的地方——的文化和宗教越来越感兴趣，这是公元后一千年来相互贸易的结果。考古发现的贵霜帝国金币，上面刻画着佛的形象与希腊字母 ΒΟΔΔΟ (Boddo, 即佛陀)，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纪。早在公元200年左右，亚历山大的革利免 (Clement of Alexandria) 就在其希腊文著作《杂集》(Stromateis) 中提到佛陀。公元393年，圣哲罗姆的《驳约维尼亚努斯》(Adversus Jovinianum) 一文也提到了佛陀。一个受佛传故事启发的宗教传奇曾在犹太一波斯传统中广为人知，人们也已经发现了相关故事在早期的波斯、阿拉伯、希伯来、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等语文中的版本。这个故事在中世纪的欧洲被称为“巴拉姆和约瑟法特” (Barlaam and Josaphat)。在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中，“约瑟法特”有多种不同的拼写，如“Budarf” “Budarf” “Yudasaf” “Iosaph”等，它其实是“菩提萨埵” (Bodhisattva) 即“菩萨”一词的讹化，意为“将成佛的人”，这里指悉达多太子，他通过开悟而成佛。

这个传说的早期版本，有不少片段似乎保存在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文献中，它们用回鹘语和波斯语写成。把佛陀故事传到了西方的，可能正是摩尼教教徒。此后，这个故事被翻译成阿拉伯语、犹太一波斯语和叙利亚语。在众多中世纪文献中，有一份早期的希腊语抄本被认为出自大马士革的圣约翰 (约公元675—749年)，尽管最近的研究否定了这一说法，因为它更有可能属于公元10世纪格鲁吉亚的修道士尤西缪斯 (Euthymios)，由格鲁吉亚语翻译而来。这个故事在中世纪被翻译成许多不同的语言，包括拉丁语、法语、普罗旺斯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英语、爱尔兰语、德语、捷克语、塞尔维亚语、荷兰语、挪威语和瑞典语，从而盛行于基督教世界。

在中世纪的欧洲，巴拉姆和约瑟法特故事的流传是当时最重要的文化现象。有关它的诗作和戏剧，在今天也许都称得上“畅销书”或“畅销节目”。在信奉基督教的欧洲，这两个名字是众所周知的，佛陀变作圣约瑟法特，成了一个圣徒，他在基督教日历中有自己的节日：11月27日。

虽然是以佛陀的生平故事为基础，但巴拉姆和约瑟法特的传说内容被重新塑造并加以补充，以适于基督徒。在基督教化的故事中，一位占星家预言，印度国王阿文尼尔 (Avennir, 或

大英图书馆佛教特展

2019.10.25 — 2020.2.23

编译：彭渤



大英博物馆所藏的一枚贵霜帝国金币，背面为佛像及希腊字母 ΒΟΔΔΟ，编号：IOC.289

欧洲、非洲的佛传故事

阿伯纳 (Abenner) 的新生儿子约瑟法特有朝一日会成为基督教信徒。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国王禁止他的儿子离开王宫。年轻的太子在对生老病死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长大。然而，当他离宫远足时，便发现了生命中的危险，他遇到了一个麻风病人、一个盲人和一个老朽的人，最后是一具尸体。在这点上，佛传故事与巴拉姆和约瑟法特传说之间的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名字被篡改了：净饭王变成了阿文尼尔王，悉达多太子变成了约瑟法特。再后来，巴拉姆和约瑟法特的传说发生了变化，有些人物相混淆了，比如佛陀的敌人提婆达多和欲王摩罗。

在知晓了疾病、老年和死亡之后，约瑟法特遇到了使他皈依基督教的隐士巴拉姆。约瑟法特的父亲试图让他的儿子放弃新信仰。他先是威胁，然后又承诺给他半个王国，但都未能成功。后来，国王遇到了术士狄奥达斯 (Theodas)——这是提婆达多名字的讹化，狄奥达斯建议他派美女去勾引约瑟法特，但也未能成功。在佛传故事

(下转4版) →